



中国特色与道统复归——论孔子政刑与德礼兼行的政治思想（论文提要）

(2005-6-28 10:31:37)

作者：郑彝元

应当确立这样的一个原则：高科技造成何自然生态破坏，就把人力转移到修复其破坏的环境上去。例如温室效应、干旱与沙漠化，就把人力安排到造林、美化环境以及相关的事业上去。国家还应当立法禁止破坏自然生态的生产力，或加徵环保税，以用于生态环境的修复工程。

总之，发展先进生产力，不应当为害人类，而应当为人类造福。

乙、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广义的文化涵盖人类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创造，包括科技、人文与宗教三大领域，体现人类社会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科技的对象是物质，宗教的对象是精神，人文则兼及心物二者。文化三大领域是一个鼎足结构，存在着一种互动互制的生态关系，是一个国家民族价值体系的集中表现。不同民族与不同的文化差异，其生态或偏于科技，或偏于宗教，或执中于人文，决定于其社会价值导向，因此，文化的先进性是相对的。任何由单极化导向建构起来的文化无法保持文化生态平衡，也不能认为是先进的。从历史上看，中世纪的罗马文化建基于政教合一制度，是野蛮落后的。当代西方文明因其偏执人性一端，科技一枝独秀，并派生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商业感官文化，把人类引向利己主义与物质主义，严重污染人心，破坏了文化生态平衡，更算不得先进。与人类历史上其他文化不同，华夏文化以人文为核心，顺天应人，执两用中，保持心物平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平行发展，故能在七千余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其先进地位。华夏文明的生命力，是由其三才一贯的宇宙观与执两用中的人性论来保证的。近代中国文化在西方科技物质文明冲击下曾经暂居下流，但一旦觉醒，复归道统，就会重新焕发出其青春活力。在邓小平“中国特色”的思想指引下，中国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事实上对此作了最好的回答。

在当代中国，如江泽民所说，“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体而言，这种先进文化，必须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说，必须具有三个方向、三个特色的文化，才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1、民族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华夏民族具有七千余年优秀文化传统。因此，文化的创新离不开华夏道统的继承。三才一贯的宇宙论执两用中的人性论是华夏道统的两块基石，它反映了古圣对宇宙与人性本具的必然性及其变化规则的认知。华夏道统中的宇宙论认为一切生命都在复杂的宇宙时空过程主宰下产生和演化，因而把生命看作宇宙现象，并从而建构了人体小宇宙生命哲学。现代人把儒家“天命”、“人性”与天人合一思想视为玄乎莫测，是因为受西方文化的表面现象迷惑，望文生义，不明白其中的必然性与规律性。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庸》所说的天命与人性，焕发出华夏道统万古常青的生命力。华夏道统中的宇宙论与人性论，具有无可怀疑的客观性及其普世意义。建设创新与传统相结合的心物平行的民族文化，就必然会体现出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

2、科学的。近世西方科技文明传入中国并为心物平行的华夏文明所融摄，就必须会使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具有科学的中国特色。这种具备科学特色的文化，必须在华夏道统中庸的价值观念宰制下发展，才有可能消除以科技于利己主义作为社会价值导向的西方物质文明的偏弊，避免复蹈西方感官商业文化的覆辙，避免只追求世俗物欲的满足，遗落人的精神需要，极端推高物的价值，贬抑人的价值，导致自然生态平衡与文化生态平衡破坏的偏弊。

创立具有科学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华夏文明融摄西方物质文明的必然结果，也是三个面向的客观要求。把民族文化同西方科技文化结合起来，把适应社会主义需要的德治，与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法治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创造出扬善与遏恶并重的、符合人性的群己善恶两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3、大众的。不能狭义地去理解先进文化的“大众”特色。大众的文化必须涵盖通俗文化与精致文化两个层次，既能满足社会成员世俗性的精神需要，也能满足社会成员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由于文化是包括科技、人文与宗教三大领域的一个鼎足结构，先进文化必须是能够涵盖全体社会成员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人类的价值取向既有物质性，也有精神性的。与科技物质领域相对应，还有一个精神、宗教的领域。人类历史从来就不存在一种没有宗教信仰的文

化。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虽然不能不把宗教包括在内。

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又说：“尧其大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的至德，但是历来当政者都很难做到。实行至德，就等于达到至道，这是尧舜“为政以德”的理想境界，所以孔子才发出“民鲜能久矣”的感叹。

“三个代表”要求把革命党改造为执政党，把名实乘远的理想主义名称改为名实相符的现实主义名称。最终以华夏道统完全取代苏式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社会双并轨并行的中庸经济生态，已经在邓小平开创、江泽民领导之下奠定了基础，正在向建立德法兼治的中庸政治生态迈进。这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社会基础，它清楚表明中国领导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三个代表”兼具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中国特色”，体现了华夏道统在三个面向的新历史条件下所焕发出来的无限生命力，预示着中共在超越政党政治与意识形态羁轭方面的重大革新与蜕变。

八、结论

文革十年浩劫应验了中国一句古话：“物极必反。”邓小平复出，“拨乱世反诸正”，（《左传》）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引导中国走上发展正路。老子说：“以正治国”。（《易经》）说：“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什么是正？中则正，不中则偏。”孔子又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又记尧传位于舜时告诫说：“天之器数在汝躬，允执其中。”实行三才一贯、执两用中的尧舜治国之道，就是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社资并行，中也，正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中也，正也；既反极左势力，也反西方自由化，中也，正也。总之，以切合人性的执两用中人文原则作为社会价值导向，引领中国走上健康发展道路，在短短时间内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迅速使华夏文明重新焕发出举世瞩目光芒，这就充分显示出邓小平“中国特色”的巨大威力。

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面对拨乱反正与开放改革的需要，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江泽民提出“与时俱进”两个思想理论原则，使所有脱离现实的、不合适的、不符合开放改革需要的、被实践证明是谬误的苏式意识形态教条，都可以理直气壮地予以抛弃。这是邓小平与江泽民开放改革路线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是对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代表先进生产力，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避免西方国家因发展科技而威胁人类生存的偏弊，保障自然生态平衡。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必须避免西方国家价值取向单极肥及其感官商业文化造成对人类精神污染的偏弊，保持科技、人文、宗教鼎足结构的文化生态平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必须超越苏式意识形态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框架，如《书·洪范》所说：“王道荡荡，无党无偏”，以中庸至德作为社会价值导向，把德法兼治的中庸政治生态构筑在社资并行的中庸经济生态基础之上，在现代、世界与未来的三个面向中，让三才一贯与执两用中的华夏道统为建构人类共同文明提供效益！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与江泽民“三个代表”，就是华夏道统的现代版。邓小平与江泽民成功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华夏道统的生命力大椿不老！

夏历岁次壬午三月廿四日立夏节，西元二00二年五月四日于曼谷所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关闭窗口\]](#)